



玻璃钻石

● 惊鸿 著



时代书局

时代书局
北京时代出版公司
北京时代出版公司

玻璃钻石

● 惊鸿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玻璃钻石 / 惊鸿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4
ISBN 978-7-80769-503-5

I. ①玻… II. ①惊…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4643号

玻璃钻石

惊鸿 / 著

出 版 人 田海明 周殿富

责任编辑 宋春 马龙 责任校对 许日春 装帧设计 范学宜 亚丽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 京 时 代 华 文 书 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 64267120 64267397
印 制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010) 87331056

规 格 635mm×955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70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9-503-5

定 价 28.00元

※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暴力的春天带着愤怒祈祷

西 渡

惊鸿的这些诗最让我惊异的是她对暴力的观察和控诉。暴力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人类的全部历史。随着暴力技术的升级，暴力的危害、暴力制度化的程度及其规模也在 20 世纪达到了它的极值。令人悲伤的是，人类并没有从 20 世纪的暴力危害中吸取足够的教训，对暴力的信仰依然是不同国家、不同种族和不同文明的人们之间最大的公约数。新世纪的恐怖主义继承了 20 世纪的暴力遗产，它刚刚在昆明火车站制造了新的血案，而眼前发生的马航客机失联事件，也影影绰绰地闪过恐怖主义可疑的身影。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暴力的直接威胁下，这是一个可悲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但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最大的现实。这还仅仅是指那些可见的有形的暴力，隐蔽的无形的暴力更是借助技术的手段扩散到了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地步。这样一种暴力几乎摧毁了或者毒化了地球上大部分居民的日常生活。惊鸿在她的诗中精敏地观察到了暴力在生活中的广泛存在及其后果，并以一个女性所有的愤怒对此给予了严厉的控诉。当我们读完整本诗集，将会发现，它始于“流血”两字实在并非偶然。

也许出于女性的视角，惊鸿对生活中暴力的观察始于长期以来掩蔽在温情面纱之下的两性关系。诗集首篇《受伤的鱼》就以揭示女性两性关系中受到的暴力伤害为主题。诗中以鱼为喻，表现了一种至今仍具普遍性的女性命运。其中的若干描写近乎血腥：“被在水泥地面摔打 / 它在扭动挣扎 / 被放在木砧板上 / 以雪亮的刀片拍

碎鱼头/血流了出来”，“而后是又一次刀锋的逼近/它银光闪闪的鳞片美丽/如落花，在刀锋迅急冷酷的刮削/亲吻与抚摩中纷纷坠落”，“刀锋切开鱼腹/鱼鳔与鱼肠被摘出”。当然，由于采用隐喻的方式，暴力的血腥程度在诗中被降低了。但诗人显然不希望读者对诗中的这些暴力描写作宽泛的理解，所以还是通过不断重复“一条哭泣的鱼/在床上翻滚”这一复沓成分对诗的主题给予了提示。不但如此，诗人在篇末还以渔夫和鱼的关系强化了这一提示：“当一支搜索窥探的桨/向她伸出/碧蓝的海底便已不是她的家/自由之地蓦然变成了无尽的陷阱”，“甜蜜的诱饵已撒满水面/吞下去 她会美丽动人但痛彻心扉”，“她丰腴的胴体已成为欲望之目的/她在幻想幸福降临 又导致了绝望的轻信/于是，在劫难逃”。这种既涉于鱼又及于女性的双重指向的描写，不仅是一种修辞的技巧，更是把鱼的遭遇和女人的命运置于同等的观察焦距之下，使其得到同等清晰的呈现。

《戒指与浴巾》重现了这一被诱捕和伤害的女性命运：“是的 是命定的悲剧/即使你在它发着蓝光/的钻石般的眼睛中沉溺/它魔术般的诱捕/让你‘感觉很好’”，“当命定的悲剧来临/即使它很美即使它充满泪水/你只有纵身跳入朱砂色的鲜红的烈火/或沉溺于那蓝色的泛着烟霭的神秘湖泊”。但此诗中以抒情主体身份出现的女性，已不像“受伤的鱼”那样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不会流泪 不会闭眼/不会像鸟一样啼血呻吟”——而有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和行动。如果说“购下了一个小小的图腾/但它是不能送人的”还属于一种被动性的防御，那么“我拒绝以自己干燥而虚弱的一生/作为放置于你记忆的橱窗内翩然而舞的蝴蝶/拒绝作为你心灵牧场的肥美纤弱的猎鹿/以自己梅花般的蹄印 装点你荒淫的青春之梦”则已包含了女性的自我觉醒，而体现在“我可以给与 也可以收回”的自主性更表明了她的自由意志。但即便如此，也难以改变女性“命定的悲剧”。

也许这正是女性命运不可思议的地方：你越是反抗命运，命运的诅咒反而更快地落到你的身上。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没有像《受伤的鱼》那样直接把渔夫和鱼的关系定性为一种对立关系。诗中的“你”无疑是指诱捕者，但这个诱捕者既可以是指男性，也可以是指欲望本身。事实上，就和欲望的关系而言，男人和女人的命运并无不同，趾高气昂的男性又何尝不是欲望的牺牲和猎物呢。这首诗所体现的这种意识的复杂性，也许是它更值得称道的地方。《醉酒的少女》《有一条白色小狗的少女》《死亡》继续上述诱捕与被诱捕的主题。《醉酒的少女》的第三人称叙述，让它得以更为冷峻的方式呈现了那个“命定的悲剧”的命定的结局：“当白马王子 轻松地吮吸过/她生命的汁液 那杏花春雨般纯洁的感觉/她唯有的一 她最为珍视的一切/丢开她 像丢开一段品尝过的甘蔗”。而《有一条白色小狗的少女》则以平淡的口吻呈现了暴力及其伤害的日常性，其悲剧性只在篇末以隐喻的方式不经意地点出：“珍奇的檀木在南方/被钢铁的锯齿截断/散发着死亡的奇异熏香”。《死亡》的结局更为悲怆，诗人的愤怒眼看要喷薄而出：“那个无名的女孩 她已无声的死亡/你不用来故作悲伤/逼真地泪流千行”，“她死于攘攘的人群 死于她的同类/倒地时插满羽箭 微弱的躯体遍布伤痕”。惊鸿当然不是两性关系中的暴力成分的第一个发现者，也不是第一个对此给予控诉的诗人，但是她确实为这种控诉提供了经由她本人咀嚼的最新证据。只要类似的暴力在生活中依然存在，这样的控诉就一定会使我们怦然心动。

第二种暴力存在于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中。很多时候，国家、社会对个人的规训看起来是温情脉脉的，因那规训的力量往往隐身于父母师长的美好名号之下，但这不能改变其本质上的暴力性质。国家、社会存在的依据就是要将个性各异的、多样的个体规训为无名无姓、彼此毫无二致的驯顺工具——但它总是以个人利益的

糖果对受训者循循善诱，借此自我粉饰，并降低其野蛮的观感。如果说在一般情形下，这种规训习惯于也善于隐藏其暴力倾向，那么当个体对规训的过程和结局表示出反抗的意向时，它也会毫不犹豫地撕下温情的伪装而赤裸裸地暴露出暴力的真面目。所以，规训总是连锁着惩罚。此集中的《中箭的感觉》敏锐地揭示了这种社会规训暴力而严酷的一面。因为“我”是一只“有自己的方向”和有着“它生命的旅程”的鸟，并把“群鸟的家”视为自己的“异地”，弓箭们便瞄准了“我”：“有人在轻控弓弦 发出冷然之声 / 冰冷的金属丝线 振动空气 / 他们的耳朵 是 如此痴迷 / 这种金声玉振的音响 // 有人在轻控弓弦 对准天空 / 以阳光的名义 以道德的名义 / 进行屠戮 无血的屠戮”。请注意这里的轻快语调当中的反讽意味。“轻控弓弦”“冷然之声”“金声玉振”，在这些美好的言辞之下是暴力的熟练技巧和无情铁面。作者在这里展示了她对语言的控制技巧和驾驭主题的能力。这里引用的片段在我看来称得上是诗集中艺术上表现最出色的段落之一。对个体施加的这种惩罚措施完全剥夺了个体的尊严，或者说它以剥夺尊严为手段，以达到驯服个体的目的：“我的尊严如一块破布 / 躺倒在你的车轮之下 / 缓缓的静静的在大地上 / 展开它薄如纸片的身躯”（《我的尊严如一块破布》）。那么，规训的成就不过是“暴力的展演”：“当催生的风 变成收割的镰刀时 / 果实的头颅 / 如被砍首的死囚 / 累累地堆积在地面”（《暴力展演》）。事实上，在万花开放的春天，暴力也没有收敛它武装的牙齿：“暴力的春天 便降临 人世了”（《暴力的春天》）。

还有一种暴力是语言的暴力。就诗歌中的表现而言，语言的暴力可以说是惊鸿的一个发现。自从海德格尔说出“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便成了诗人们寄予最多温情的对象，恨不得把诗歌赖以建立存在之基础的全部家当都委托给嘈杂的语言寄存处。但惊鸿告诉我们，

语言也可以是一种暴力。事实上，在语言发挥作用的两端，在“说”和“听”之间，隐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通过“台上”和“台下”的形式予以强化。某种程度上，在实现暴力的目的上，“说”比直接的暴力更有效，笔比剑更强大。所以，巴尔扎克有言：“彼以剑创其始者，吾将以笔竟其终”。而国家的代理人也从未放弃过笔的事业。国家、社会对个人的规训也正是借助语言来进行的：“他说……/以宣谕真理的口吻/背靠着黑暗/背靠着广大的黑板/一个××主义的辩护士/目光炯炯/得意洋洋/……重复着，已破损不堪的国家机器的轰鸣”（《他说》）。惊鸿在此准确地指出，“说”从来不是说话人单枪匹马的独角戏，它始终依附于权力，“背靠着黑暗/背靠着广大的黑板”，并小心附和着国家机器暴力的节奏。“说”也可以采用一种惊艳的方式：“她说，翕动着涂满口红的鲜红的嘴唇/她说，眨动着模拟白种人的蓝色眼影/她说，以《上海宝贝》中都市娼妓的性感”（《她说》）。《他说》中抱残守缺的土著做派，在《她说》中转换为激流勇进的舶来话语，但尽管姿态不一，对权力的依附却没有二致。语言的暴力有时堪比弹雨：“语言的瀑流倾泻于耳/一只只半透明的、冻玉般的耳朵/一个老朽/背靠着黑暗/干黄的面色/与凝滞的心/智慧的眼镜/与冰凉的手指//在语言的瀑流中倾泻污血/近百年来的沉滞的污血和血块/从他的口中纷纷跌落/倾注于我童贞的耳朵/别无选择/我/只有洗耳恭听/默默忍受”（《语言施暴》）。在这里，“说”（无论它借助的是“他”或“她”的嘴）自觉地代表权力和真理，对“听”进行暴力的规训，麻木、僵死、无知无觉的人成为这座规训工厂的标准产品，最终把“听”驯化为“说”的同义反复，“受虐者”转化为“施虐者”：“话语是鞭子/抽打着它麻木的身躯/神经僵死/感觉不到疼痛/无知无觉地/却秉承了/抽打者的凌厉与粗暴//瞬息间，受虐者变为施虐

者”（《施虐》）。经由这种方式，“听”被置于自己的命运之外，并被剥夺、取消了未来，变成了一条条空心的管子：“他在宣谕真理 / 而我们是暴露在墙外的 看 / 那一条条曲折的肮脏的银白色管子 / 空心的 畅通无阻 / 那是我们的未来”（《语言施暴》）。语言的暴力借此完成了自我循环，成为《罗兰之歌》中杀不死的怪物奥里罗。暴力历史奇怪的同义反复就建立于语言的这一自我循环机制中。

暴力具有传染性。在一个暴力无所不在的世界上，人人都有被传染、被毒化的可能：“我脆弱透明的皮肤已经被她的毒牙咬破 / 我的身体和血液 已经感染了 / 她淫荡无耻的身体垃圾 / 我已奄奄一息 无力自拔 / 很快要变成 她飞扬跋扈的同类”。于是，被传染的“我”发出了“我要杀人”的呐喊：“我是疯子 我要杀人 / 我是疯子 我要杀人 / 我是绞刑架下那个疯子 那个天真的疯子 / 我要杀人 杀那个猫脸的白衣女人”（《我是疯子 我要杀人》）。其实，暴力的这种传染性正是暴力不死的秘密。暴力的诸多特征中最诡异的一面也许在于，除了自我复制，它还兼长把暴力的复仇转化为暴力的生殖，借此完成它的另类自我循环。然而，在这危急的时刻，在惊鸿的诗中升起了另一种语言：

泉水 我梦中的泉水

那个弥漫着淡淡白雾的梦中的森林

那奔跑在春的森林中的少女们

赤裸着洁白的身体的纯真少女们

快来救我！为什么还不来救我？你们！

一个无辜的中了箭毒的垂死的同类

快，为我取来泉水

快，为我取来泉水

这是一种祈祷的语言。大约百年前，吉皮乌斯就富于洞见地指出，诗歌是一种祈祷。我相信，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诗歌性质的最好的说明。在通常情形下，“说”是主动的，“听”是被动的。在这种关系中，“说”的滔滔瀑流完全无视“听”的存在，顶多把后者视为被动的受纳容器，其目的则是把“听”转化为自身的同义反复。但祈祷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它颠覆了“说”和“听”之间固有的权力关系，它提升了“听”的地位，把“听”变成了“说”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诗就是萌芽于此。在我看来，惊鸿在这里不经意间已然实现了诗的本质。惊鸿的祈祷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带着愤怒的祈祷，或者说是一种危机时刻的祷告，它把拯救的迫切性醒目地凸显出来：“快，为我取来泉水 / 快，为我取来泉水”。这两行诗的超乎寻常的速度，体现的不仅是诗人对语言的敏感，更是她对人的处境的敏感。在一个暴力的世界上，我们怎样生活？诗人的回答响应了斯蒂文斯关于诗的著名定义：它是一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外在暴力。这个公式在同义反复式的以暴抗暴和屈从暴力之外，为我们提供了第三种对待暴力的方式：内在的暴力。怎么理解斯蒂文斯所谓内在的暴力？在我看来，内在暴力应该是一种内心的秩序，一种对某物即使失败仍有意义的确信，一种即使被拒绝仍然坚持爱和给予的意志。或者如惊鸿诗中所说，它是一种具有治愈之工的“泉水”，既使我们免于受到暴力的传染，又使我们免于对暴力的屈从。它还应该像惊鸿用以给这本诗集题名的“玻璃钻石”一样，既晶莹剔透，又坚不可摧。这样一种内在的秩序，在暴力的世界上为我们提供了一块可能的立足之地。

当我们把祈祷看作诗的本质，我们将面临三个问题：谁需要这些祈祷？诗人向谁祈祷？祈祷的意义何在？吉皮乌斯一方面极富洞察地把诗定义为祈祷，另一方面却又悲观地认为，在现代语境中，

诗是最无目的，最不被人需要的东西。为什么祈祷既是“人的天性之自然的必要的需求”，“我们每一个人都极其需要、理解和珍视的”，作为祈祷形式之一的诗，却又不被任何人需要？吉皮乌斯认为，这是因为现代流行的孤独意识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分开，使他特殊化，逼迫他紧闭起自己的灵魂。孤独确乎是一种现代病，但吉皮乌斯不免把这种孤独的情形绝对化了。事实上，孤独也可以是走向他人和世界的开始。正如当代诗人骆一禾在赞扬但丁的场合所说的，“但丁使孤独达到了万般俱在”。这是孤独的超越自身的境界。回到我们的问题，谁需要这些祈祷？第一需要的当然是诗人自己。如果一首诗连写下它的诗人都不需要，那么，它当然也不会被任何人需要。但事实上，仍然还有很多诗人在孜孜不倦地制造那种连自己也不需要文字垃圾，还给这种写作贴上“现实主义”“底层写作”“人民性”种种占据伦理制高点的标签。正如惊鸿的这些诗所表明的，诗首先总是诗人为自己的祈祷——它们是诗人在一个暴力的世界上自我拯救的努力，一种净化的“泉水”。它们确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其次，诗也为更多的具有类似处境的读者祈祷，并为他们所需要。我不能确指这样的读者在哪里——也许俗话说得对，读者总是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但我相信，这样的读者一定在某个地方，而且等待着这些诗，这些带着愤怒的祈祷。

第二个问题，诗人向谁祈祷？对于古典诗人，这似乎不成为一个问题。对于某些当今的宗教诗人，这也不会成为问题。因为，祈祷总是向着某个诗人所信仰的神明。但对于汉语诗人，尤其是当代汉语诗人，这却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任何共同的或私人的信仰。不管如何，我们总不能向财神或银行祈祷吧。不过，这也许是表面的现象。只要诗人还在写作，至少我们还拥有对语言的信仰。诗人用语言祈祷；从心理的观点看，诗人也是向语

言祈祷。那么，语言是一个未来的神明吗？我个人的看法，对中国诗人来说，语言一直是神明。中国士人的心灵世界，实际上是由诗的语言之光点亮的。换句话说，诗一直是中国士人的信仰。想想，如果我们在中国文化中拿掉诗，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其实，如果中国文化中没有诗，那才真是万古长如夜。幸运地，诗人们还没有完全失去这种对语言的信仰。当然，诗人所信托的这种语言完全不同于那种规训的“他说/她说”的语言。实际上，诗人的祈祷就是要从那种“他说/她说”的语言中拯救语言。或者如诗人们爱说的，创造一种语言。诗人通过拯救语言来拯救人性，也就是在我们的内心建立起“一种内在的暴力”。某种程度上，一种祈祷的语言就是一种形成中的信仰，或者说，一个形成中的上帝正是由祈祷的语言孕育而来。如果这种祈祷的语言为更多的人所拥有，甚至为一个民族所拥有，那么一个新神的诞生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祈祷的意义何在？事实上，我在上文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此，我只想顺便指出，惊鸿的这些诗恰好为祈祷的意义提供了富有成效的最新范例：即使在没有读者的情形下，作为祈祷的语言，这些诗仍然为诗人提供了一种庇护。随着这本诗集的问世，这些诗就要振动它们透明的翅膀，去寻找自己的读者。我相信它们会找到自己的读者，我也相信它们有能力为这些幸运的读者提供同样的庇护。在这个充斥着暴力的世界上，这样的庇护是必要的，也是宝贵的，而且是被迫切需要的。

2014年3月10日-3月13日

序 二

如果无法前行，就选择好站立的态度。这样至少在时光和生命面前，灵魂和思想可以凭一种优雅的仪表，坚定着自身的价值。十多年后的今天，再一次读到惊鸿的诗作，我深深地感受到人不仅仅要活着，还要活得有尊严，有立场，这尊严是耐性，这立场是坚持。

1998年夏天，也是我来北京闯荡的第二年，那是在一家广告公司，我认识了惊鸿，我已在那里工作一个月了。她第一天来，她只在那里待了一天，那一天她认识了我。很巧我们都住在北大，我们同坐一路车回去，在同一站下车，我下车请她吃了顿饺子，因为我没见她中午吃东西，尽管我兜里也就不到一百块钱，那也是我全部的积蓄了。她告诉我她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分配到新华社河南分社，她说她还想要回到北大，她要考这里的研究生，家是河南农村的，父母没有钱再给她读书了，她想在北京边找份工作，复习，待考。以我的判断，她要找份临时工作真的很难，她几乎不会跟人打交道，一个女孩，长相也不出众，没有像样的衣服，总之跟环境的反差极大，但我喜欢跟她待在一起，我喜欢她犀利眼神里的那份纯真，我欣赏她轻言细语下的严密逻辑和思维。她时时的不安却总能给我某种保证。她的手上什么都没有，却总是捧着本书。

后来，我在北大西门找到了一间平房，一个大杂院，也不知道住了多少人，天南地北的，哪儿的口音都有，屋里就两块板，放上被子就是床，连个桌子都没有。白天我上班，惊鸿读书，晚上下班，我给她做饭，饭很简单，清水煮挂面，吃完了，就去北大未名湖边

坐着，开始我们最美的时光。我写诗给她念，她告诉我哪句好，哪句需要改一个字。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讨论电影，古典音乐，绘画，说得最多的是各自的童年和故乡。那时未名湖边有很多灌木和杂草，晚上到处都能看见萤火虫，后来我写过一首诗：“清贫有什么不好，还有萤火虫。”那时我们都二十多岁，困的实在不行了，才回去睡觉，屋里蚊子太多。当我发工资的时候，惊鸿就带我去当时的万圣书园买书。

秋天，她搬到了清华大学，那一年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生。1999年，我搬到了大河庄一个有暖气快被拆迁的平房，夏天，惊鸿来看过我两次，我只记得那年，雨很大，蝉叫得很响。她进到我的房间还是坐在一个小角落里，安静地看着书，等我做饭给她吃。2000年秋天，穿过万泉河附近的稻田，我去清华大学找惊鸿，她拿出了她的诗作，我第一次读到了《受伤的鱼》《我的尊严如一块破布》《留学！留学！》《苏州桥之春》等诗作。

她的语言没有杂质，节奏流畅，尽管犀利得让人无处躲藏，还是给你无限的空间前行，感性与理性交织在一起。她的诗有时像海浪，一浪一浪拍向岸边，有时像一把匕首，将血肉劈开，直击要害。内心的情绪，支撑着巨大的生命能量在艰难里冷静地前行。诗是无限宽广和自由的，这使我们可以不借用任何外界条件直接去表达，在那样的时空里，这个来自中原农村乡野的孩子，在北大清华的路上，以诗的方式留下了她的生之味，我喜欢她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要真理，不要面子”。

2002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童年河》，那是在众多朋友的资助下才得以完成的，之后惊鸿也曾跟我商量，出一本自己的诗集，当时我们没有条件。2005年的冬天，我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把父母从黑龙江老家接来，除夕前的一天，惊鸿抱她刚出生不久的

女儿和她的丈夫来看我。当我送他们一家三口出门的时候，我从认识她就为她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生活好一些，我们的梦也就有希望一些。

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一年，我既没有听见蝉声，也没有听见雨声，这一年，我深爱的母亲突然去世了。没见惊鸿，我也不愿再去北大或清华，我会迷路。我和惊鸿在北大西门住过的平房，变成了停车场，我熟悉的路都消失了，到处是楼，天空不是原来的颜色。后来我知道，惊鸿的父亲也是在这一年，去世了，因为车祸。2012年，夏天，我捧着我的新诗，去征求她的意见，她只是把需要改的字用铅笔圈出，依然很轻地对我说：“你写得很好，能坚持下来就不易”。我们坐在光大花园的椅子上，微风轻轻吹过，亦如在很多年前在未名湖边一样。

今年惊鸿成了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后，又住进了北大，她一直希望她的诗能结集出版，以了她多年的愿望，她走了一圈又回到这里，内心的坚守成就了她最初的理想。为了给她的新诗集写序，我又来到北大，走进承泽园她的宿舍，屋里除了床就是书，她的世界始终这样洁净，这洁净最终将成就她的才学。近黄昏的时候，我们漫步在未名湖边，湖水是那么清瘦，两边没了那些灌木，秋天却是绚丽的，晚饭时间惊鸿在学校食堂请我吃了顿饺子。

在她的诗集《玻璃钻石》出版之际，仅以我拙笨的文字向她祝贺，同时也纪念我们共同走过的那段艰难而本分的时光。

缓缓的

我躺在河流之上

凝视着

一个草筐顺水漂流

一个赤身的婴孩
在稚气地摆弄
它的白色手掌。

我们都有孩子一样的心，岁月不老，我们也无需长大。缓缓的
河流会带我们漂向哪儿？我们安静地等上天的回答。

范学宜 于北京四季码头

2013年10月28日

目 录

在暴力的春天带着愤怒祈祷 / 1
序 二 / 10

· 受伤的鱼 ·

受伤的鱼 / 3
戒指与浴巾 / 8
语言施暴 / 12
中箭的感觉 / 14
蜗牛，雪中的蜗牛 / 17
施 虐 / 18
乌 鸦 / 19
他 说 / 21
她 说 / 23
缓缓的，我躺在你的河流之上 / 25
Snake / 26
有一条白色小狗的少女（风尘女郎） / 28
醉酒的少女 / 30
疯 狂 / 32
死 亡 / 34
流 言 / 36
猫脸的女人 / 37